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入选期刊

中国诗歌研究

ZHONGGUO SHIGE YANJIU

(第九辑)



赵敏俐 主编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入选期刊

中国诗歌研究

ZHONGGUO SHIGE YANJIU

(第九辑)



赵敏俐 主编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歌研究. 第9辑/赵敏俐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097-4884-8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3339 号

中国诗歌研究 (第九辑)

主 办 /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 编 / 赵敏俐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黄 丹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黄 丹

责任校对 / 王伟涛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884-8

定 价 / 79.00 元

印 张 / 22

字 数 / 438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诗歌研究》学术委员会

主 任 罗宗强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东岭	孙玉石	李炳海	张燕瑾
吴思敬	洪子诚	赵敏俐	袁世硕
谢冕	詹福瑞		

《中国诗歌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赵敏俐

副 主 编 左东岭 (常务) 吴思敬

责任编辑 雍繁星 张桃洲 孙晓娅 郑俊蕊
马富丽

目 录

· 明代诗歌研究 ·

- 宋濂《越歌》考论 孙小力 / 001
- 明初台阁体的前世今生
- 兼论中国诗歌史中治世之音的评价问题 严 明 孙燕娜 / 012
- 元末明初诗书画“三绝”艺术与同题集咏的生命寄托 陈博涵 / 025
- 论晚明布衣诗人程嘉燧的人格心态与诗学思想
- 从钱谦益对程嘉燧的推崇谈起 王馨鑫 / 036

· 古代诗歌研究 ·

- 《周颂·载见》与西周朝觐礼 姚小鸥 李文慧 / 049
- 《蟋蟀》之“志”及其诗学阐释
- 兼论清华简《耆夜》周公作《蟋蟀》本事 陈民镇 / 057
- 《周易》奠定“以男女喻君臣”比兴模式的文化基础
- 鲁洪生 孙亚丽 / 082
- 龙井昭阳与《楚辞抉》 黄灵庚 石川三佐男 / 093
- 《楚辞》编纂体例“经传说”析论 邵 杰 / 111
- 宋玉的审美理想与艺术创造 张法祥 程本兴 / 131
- 论两宋理学家文道观的类型、特征及其内在矛盾性 王培友 / 153
- 日本古代的汉诗新学
- 《古代汉诗选·序》 兴膳宏 著 白如雪 译 / 171



· 现当代诗歌研究 ·

寓言的颓废

——《野草》中的诗与哲学 王东东 / 178

诗人张枣论 曹梦琰 / 225

· 青年论坛 ·

关于谢灵运山水诗美的再认识

——与蒋寅先生商榷 刁文慧 / 244

钟嵘诗学视域下颜延之的诗歌创作 廉水杰 / 254

元兢“调声三术”分析 魏学宝 / 266

论王维的“庄禅合一”思想及其诗歌中的“庄意” 万伯江 / 282

诗学变革中的“游戏”姿态

——黄庭坚的戏题诗写作及其诗学意义 姚 华 / 296

《通雅·诗说》作年考辨 商海锋 / 311

· 诗歌文献研究 ·

吴中复年谱 王可喜 王兆鹏 / 315

宋濂《越歌》考论

孙小力*

【内容提要】 本文论证宋濂《越歌》具体的写作时间、创作缘由，进而考察宋濂的诗歌创作道路。不论是从内容风格着眼，还是从创作动机来看，《越歌》都是追随杨维禎的《西湖竹枝歌》和《吴下竹枝歌》，实为中年时期的宋濂变换诗风的一个标志。然而这样学习民歌的诗歌创作昙花一现，持续时间很短。其中原因，与当时战乱动荡、宋濂人生道路转折，及其一贯坚持、晚年力倡的文道合一的文学宗旨密切相关。宋濂诗少文多，原因也在此。

【关键词】 宋濂 杨维禎 《越歌》 《西湖竹枝歌》 诗风变化

以文章大家著称的宋濂，也曾有志于诗歌创作，尤其是50岁之前，孜孜矻矻二三十年，写了许多诗歌。但是一方面宋濂自我要求比较苛刻，随作随焚，流传后世的诗作不多；另一方面，宋濂也曾有过诗歌主题内容、艺术风格的转向，或者说革新，但是这样的创作变向持续时间不长，作品不多，成就尚未充分显现就偃旗息鼓，因此其诗歌创作未能受到当时和后人太多的关注。本文以宋濂四十六七岁时创作的“竹枝体”组诗《越歌》为切入点，探讨宋濂曾经有过的诗歌热情、诗风变化，以及他后来不再热衷诗歌创作的原因。

* 孙小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宋濂《越歌》写作时间考

为便于以下的考论，照录宋濂《越歌》八首如下^①：

劝郎莫食鉴湖鱼，劝郎莫弃别时衣。湖中鲤鱼好寄信，别时衣有万条丝。（其一）

恋郎思郎非一朝，好似并州花剪刀。一股在南一股北，几时裁得合欢袍？（其二）

越王台下是侬家，一尺龙梭学织纱。愿郎莫栽梨子树，遮却房前夜合花。（其三）

溪头送郎上兰舟，独宿春风燕子楼。溪水有时干到底，不如侬泪四时流。（其四）

阿侬羞杀黄帽郎，桂舟兰楫藻中藏。芦竹生花秋满地，棹歌才动便寻榔。（其五）

粉痕随泪湿春罗，郎似芭蕉侬似荷。荷叶团圆暝莲蕊，不比芭蕉纹路多。（其六）

为郎有意办罗裳，绣成花鸟好文章。黄昏含愁不敢剪，只恐分开双凤凰。（其七）

春望山头松百株，若耶溪里好黄鱼。黄鱼上得青松树，阿侬始是弃郎时。（其八）

宋濂于此组诗《越歌》题下自注曰：“约杨推官同赋八首。”笔者认为：此“杨推官”不是别人，正是铁崖先生杨维禎（1296～1370）。理由有三：

其一，目前所知宋濂与杨维禎开始交往的明确记载，是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二月。当时宋濂的弟子郑涣登门造访，请求杨维禎为宋濂《潜溪后集》撰写序文，那时杨维禎的官职，恰恰是建德路总管府理官，而“理官”又称“推官”。

其二，宋濂《越歌》的内容和形式，与至正初年杨维禎提倡的《竹枝歌》（又名《竹

^① 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第2201页。（按：此本《越歌》八首据胡凤丹《金华丛书》本辑补。）

枝词》)几乎没有区别。我们试以其中两首稍作比对,就会很明白。例如《西湖竹枝歌》九首之四:“劝郎莫上南高峰,劝我莫上北高峰。南高峰云北高雨,云雨相催愁杀侬。”《越歌》第一首与它十分接近。又如《吴下竹枝歌》七首之二:“家住越来溪上头,胭脂塘里木兰舟。木兰风起飞花急,只逐越来溪上流。”^①《越歌》第四首和它也有几分相似。

其三,明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杨维禎因患肺病在松江(今属上海市)去世。“濒终,召门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华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铭我。尔其识之。’”后来宋濂不仅欣然接受请求,在墓志最后还这样写道:“濂投分于君者颇久,相与论文,屡极玄奥。”^②可见宋濂、杨维禎具有共识,相互视为知音,而且两人交往历史颇久。

结合上述三条材料,笔者曾经推测,宋濂与杨维禎的结识,不迟于杨维禎出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时期,且相互之间曾有诗歌唱和,《越歌》只是其中的一种。^③

近日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看到宋濂诗集《萝山集》^④。《越歌》收录于此本卷二,诗题下亦有宋濂自注“约杨推官同赋”。不过与如今通行的《宋濂全集》本相比,缺少“八首”两字,且诗歌总计为十四首。其中八首与《宋濂全集》本所载《越歌》仅有个别字词的差异,其余六首则未见于其他各种版本的宋濂诗文集,兹亦抄录如下:

阿侬不如比翼禽,阿侬难学线头针。化为五色鸳鸯锦,时衔红羞到郎心。(原本之四)

不敢劝郎瓮头春,恐郎醉后忘侬恩。殷勤只酌湖上水,郎若怜侬甜似饴。(原本之五)

一日从郎百岁同,手持白石掷河中。石若转时侬心转,祝郎好去莫疑侬。(原本之六)

自郎一去水上萍,东风吹到巴子城。郎心纵似黄梅雨,五月过时也有情。(原本之七)

侬心恨如江水深,侬身瘦似蕺山苓。郎若不皈侬成腊,谁将苧带结同心。(原本之十)

① 所引《西湖竹枝歌》《吴下竹枝歌》,皆载《铁崖先生古乐府》卷十,《四部丛刊》本。

② 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载《铁崖先生古乐府》卷首,《四部丛刊》本。

③ 参见拙著《杨维禎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元顺帝至正十七年”条。

④ 好友黄灵庚先生主动提供《萝山集》扫描本,并摘录部分惠寄笔者,此致谢意。按:《萝山集》今存抄本,藏于日本。



有郎金凤饰花容，无郎秋鬓若飞蓬。侬身要作千年白，不必来涂红守宫。（原本之十二）

这六首《越歌》，与杨维祯的《竹枝歌》同样接近。例如《西湖竹枝歌》九首之五：“湖口楼船湖日阴，湖中断桥湖水深。楼船无柁是郎意，断桥有柱是侬心。”《西湖竹枝歌》九首之九：“望郎一朝又一朝，信郎信似浙江潮。床脚搗龟有时烂，臂上守宫无日销！”《吴下竹枝歌》七首之七：“小娃十岁唱《桑中》，尽道吴风似郑风。不信柳娘身不嫁，真珠长络守宫红。”都是用民歌的形式、女子的口吻，彰显女子有关爱情的誓言，及其矢志不渝的忠贞，上引《越歌》六首与它们如出一辙。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从主题内容，还是从形式风格着眼，《越歌》都类似于《竹枝歌》。其实古人也早就发现了这一点，明代卓人月、徐士俊选评《古今词统》，就将上引杨维祯《竹枝歌》和宋濂《越歌》多首，一并视为“竹枝”，分别纳入了“西湖竹枝”和“镜湖竹枝”等小类之中。

但是，既然《越歌》是追随杨维祯而作，又是《西湖竹枝歌》《吴下竹枝歌》的“仿制品”，为何宋濂不像之前众多参与唱和的诗人（如张雨、顾瑛、郭翼等人）一样，直接加入《竹枝歌》的传唱，反而另起名目，改称《越歌》，还要约请杨维祯唱和，反客为主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搞明白宋濂撰写《越歌》的确切时间和地点，然后才有可能根据宋濂当时的实际情况揣摩他的心态。

《萝山集》卷首有宋濂友人郑涛所撰序文，序文作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十一月。但是我们决不能据此认为，《萝山集》就是至正十三年末的结集。《萝山集》五卷，各卷编纂人员不一，编纂时间也有不同。全书编排没有固定的体例，既不按照诗歌体裁，也不依据时间先后，其中大量作品，其实诞生于至正十三年之后，其中也包括《越歌》。

《越歌》收在《萝山集》卷二，此卷是全书中唯一注明写作时间的一卷，卷末有宋濂的明确题识：“右此卷诗凡百余首，皆乙未、丙申岁作也。”“乙未”是至正十五年（1355年），“丙申”是至正十六年（1356年），据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越歌》确切的撰写时间。因为杨维祯从杭州税务官转任建德路总管府理官，是在至正十六年秋季。^①建德路总管府设在睦州（今浙江建德市），距离宋濂当时授学所在地浦江县不远，所以宋濂撰写《越歌》并“约杨推官同赋”，只能是在至正十六年秋冬。

明白了《越歌》具体的写作时间，也就是确定了《越歌》在《萝山集》卷二中的时

^① 参见拙著《杨维祯年谱》“元顺帝至正十六年”条。

间位置。确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尽管《萝山集》的编排看似杂乱无章，但是卷二所收诗歌却具有某种共同的风格特点。之所以这样认为，因为宋濂本人对于《萝山集》卷二诗歌有过概括性的总结，上引宋濂题识的完整版本原来是这样的：“右此卷诗凡百余首，皆乙未、丙申岁作也。情寓于词，颇多缪韞纤弱。漫钞新稿后，以俟他日删去。”所以尽管从体裁上看，此卷诗歌除了民歌体的《越歌》之外，还有古乐府体和五言古体，形式并不统一，但是其内容风格却颇多相似。另外从时间上看，尽管《越歌》是受到杨维祜的直接影响以后所写，属于《萝山集》卷二这一百多首诗歌中比较晚出的作品，但是与至正十五六年间宋濂其余的诗歌还是保持了一致，包括主题与风格。事实也确实如此，比如卷中的《越女谣》，起首就是一句“人言越女天下白”；《春愁曲》则更为缠绵，“妾颜如花娇蕊蕊，妾若比花妾能语”，呈现诸多柔媚；此外诸如《美人篇》《采莲辞》《秋千辞》《红楼引》《秋夜长》《芙蓉篇》等，都具有“情寓于词，颇多缪韞纤弱”的特点。

那么，为何宋濂至正十五六年间的诗歌内容和风格，会具有这样不同于以往的“重情”“纤弱”的特点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宋濂学诗的历史。

二 宋濂学诗困惑及其诗风变换

宋濂早慧，幼年即以吟诗作歌闻名乡里，人称“神童”。20岁时，他带着诗稿求教于本地诗人吴莱，未曾想老师的一番话，将宋濂吓出一身冷汗。有关此次造访经过，以及吴莱此番言论对于宋濂以后诗歌创作的影响，同门友人郑涛有过较为详细的描述：

先生年二十时，橐其所为诗往见之，吴公读已，谓先生曰：“子欲应世用邪？则诸诗诚过人矣。若曰‘追轍古作’，则未能窥其藩翰，况闾奥乎！”先生惊曰：“何谓也？”吴公曰：“学诗当本于《三百篇》，夙夜优柔展转，分别六义，有以识其性情之真，而后沉酣楚词，潜泳汉、魏诸什，以察其变。参摩六朝、隋、唐，以迄于宋季，以审其别。所谓察之审之者，非猎袭之谓也。必穷其体裁，按其音节，考其辞句，观其气象，原其奥致，如权衡轻，如分清浊，然后识精而见确。更加以深诣之功，日就月将，孜孜弗懈，始可以言诗也已矣。”先生不觉汗流浹背，于是悉焚所为稿，一依吴公之命而致力焉。及吴公既歿，先生复登柳（贯）、黄（潘）二公之门。二公之所传授，与吴公不异。先生益务刻深为之。二十年间，随作随焚，常有歉然不足之色。

吴莱是仙华山人方凤的孙女婿，自幼追随方凤，深得诗学奥妙。宋濂先是追随吴莱，

后又从学于柳贯、黄潛。尽管学诗写诗的热情始终不减，眼界却大为抬高，自己写就的诗歌，首先就很难入自己的法眼，因此不断焚毁诗稿，致使其 40 岁以前的诗歌大多未能流传。

事实上宋濂早年的诗作，也有名家给予过好评。郑涛曾经将宋濂准备焚毁的一部诗稿带到京师，揭傒斯就曾高度赞赏，说宋濂的诗歌“如宝鉴悬秋，随物应象，无毫末不类。及至其玄妙自得，即之非无，索之非有，莹彻玲珑，不可凑泊，足以映照古今矣”^①。不过宋濂后来听说了这样的褒奖，却并不表示认同。也许是深受吴莱的影响，宋濂对于自己的诗歌，有着更为严格的标准和更高的要求。现在看来，吴莱对于宋濂的教诲，其实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溯源察流，深诣博采。教诲固然不错，但是要真正做到却非易事，而且求之过切，往往可能导致畏难情绪。宋濂就曾经颇为感慨地对郑涛说，学诗的难度与学文相比，相差“何翅十倍”。还说学诗犹如登山，常常自以为登顶，其实尚在半山。^②

那么，究竟如何超越以往，如何突破困境呢？根据郑涛为《萝山集》所撰序文，直到至正十三年冬郑涛撰序之时，似乎宋濂仍然在努力探寻，并无豁然开朗的迹象。而《萝山集》卷二至正十五六年间所撰的那些诗，应该就是宋濂有所开拓或改革的结果。

目前我们并无证据证明，至正十六年杨维禎与宋濂最初结识之时，指导过宋濂的诗歌写作，但是宋濂效仿杨维禎的《竹枝歌》而写作《越歌》，并非无的放矢，很可能与他突破诗歌写作困境的追求有关。因为杨维禎在中年以前，也曾有过与宋濂相似的苦恼，而后后来其诗歌焕发生机，正是有赖于《西湖竹枝歌》的创作和传唱。

杨维禎《西湖竹枝歌序》说：

予闲居西湖者七八年，与茅山外史张贞居、苕溪郑九成辈为唱和交。水光山色浸沈胸次，洗一时尊俎粉黛之习，于是乎有《竹枝》之声。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韵士属和者无虑百家。

所谓“闲居西湖者七八年”，正是至正初年杨维禎“失官”期间。当时他在杭州一带浪游，得以更为广泛地接触社会，为他在诗歌形式和内容方面的革新创造了机会。吴复《辑录铁崖先生古乐府叙》也有相关记载，而且更为真实地记录了杨维禎当时弃旧图新的

① 揭傒斯卒于元至正四年七月，因此郑涛携至京师供其品评的诗稿，大致应该是宋濂 30 岁左右所作，或其早年的诗作。这些诗歌在今存《萝山集》中保留极少。

② 详见《萝山集》卷首郑涛至正十三年十一月所撰序文。

举动：

先生在会稽时，日课诗一首，出入史传，积至千余篇。晚年取而读之，忽自笑曰：“此岂有诗哉！”亟呼童焚之，不遗一篇。今所存者，皆先生在钱唐、太湖、洞庭间之所得者云。^①

以上两篇文章，前者撰于至正八年七月，后者撰于至正六年三月。后者所谓“晚年”，其实是相对早年而言，确切地说，正是杨维禎 50 岁前后，即前者所谓“闲居西湖”期间。也就是说，杨维禎于至正初年浪游杭州、吴兴、苏州等地，率领友人吟唱《竹枝》，一时风靡各地城镇，因此醉心于《竹枝》清新天真的格调，遂将旧日那些取材史传、雕肝琢肾的诗歌悉数予以毁弃。

杨维禎本人学诗写诗的经历，对于宋濂而言，其实就是最好的教科书。宋濂之所以“二十年间，随作随焚”，除了“刻深为之”、自我要求比较严格以外，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尚未发现使其诗歌焕发生机的源泉。诗歌来自何处？应当来自山，来自水，来自社会，来自心灵，而不仅仅如吴莱所谓“沉酣楚词，潜泳汉、魏”。所以笔者认为，宋濂与杨维禎的结识与诗歌唱和，对于宋濂诗歌的革新和诗风的改变，十分有益。

如果说杨维禎在元季的成名，得益于两种诗歌体裁，一是古乐府，二是《竹枝歌》，那么至正十五六年间宋濂的诗歌创作，与杨维禎可谓不谋而合。《萝山集》卷二的一百多首诗歌，大多属于这两类诗歌体裁，除了《越歌》之外，《越女谣》《采莲辞》《莫徭行》之类属于民歌风，而《龙阳君行》《韩朋行》《海东行》《并州行》之类则皆为古乐府体。因为当时有着共同的偏好，宋濂与杨维禎之间的诗歌唱和应该十分自然。然而杨维禎任职于建德并与宋濂交往，是在至正十六年秋冬，《萝山集》卷二的大量诗歌则产生于此，也就是说，宋濂诗路的拓宽和诗风的改变，应该是自发开始的（原因后述），而杨维禎的到来，只能说是一种助推而已。如前所述，《萝山集》卷二的百余首诗，与《越歌》有着共同的风格特点，说明宋濂在追随杨维禎的《竹枝歌》之前，已经有意无意地开始了以情为诗的诗歌实践，只不过《越歌》在形式上更为张扬明显。换言之，宋濂追随杨维禎的《竹枝歌》并约请其共同撰写《越歌》，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举动。

杨维禎青睐于宋濂，惺惺相惜之情从杨维禎所撰《潜溪后集序》中可以清楚窥见。除了赏识宋濂的才学，以及与当时的宋濂有共同的诗歌偏好外，杨维禎与宋濂交好，还

^① 文载《铁崖先生古乐府》卷首。



有诸多原因：两人的家乡相距不远，宋濂曾到诸暨求学，因此有共同的地缘关系；吴莱、柳贯、黄潛，都是他们的师长或友人，尤其是黄潛，既是杨维禎的师友，又是宋濂的老师，因此有共同的人缘关系；两人都是主学《春秋》，因此有共同的学术渊源和旨趣。凡此种种，奠定了两人友谊的基础，也是宋濂主动约请杨维禎唱和《越歌》的基础。

在此我们还需拈出一个字来再做讨论，就是上引宋濂《越歌》题下注中那个“约”字。众所周知，至正初年杨维禎声名鹊起，与当时他在杭州、湖州、苏州一带倡导《西湖竹枝歌》大有关联。也就是说，《西湖竹枝歌》是杨维禎赖以成名的文学活动之一，并且持续多年。在此期间，杨维禎逐渐引领东南诗坛，南北诗人纷纷响应，参与者多达上百人。但参与者无论资格深浅、年龄长幼，都是以杨维禎为主唱，他人追随附和。那么以此类推，宋濂追随杨维禎的《竹枝歌》，仍然应该是以杨维禎为“主唱”，宋濂为“附和”，宋濂何以改“和”为“约”，成为主角了呢？

可能的原因不外乎两种。其一，两人之间的唱和并非仅有一次。尽管目前我们找不到杨维禎在元代主动邀请宋濂唱和的诗歌，但是宋濂“约杨推官同赋”的《越歌》，或许不是他俩初次唱和的作品，而是你来我往的再次或多次以后的相邀。但是这样的解释，仍然不能回答另一个关键问题，杨维禎赖以成名的是《竹枝歌》，如果宋濂只是附和，没有改称《越歌》的必要。因此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应该是第二种：宋濂“约杨推官同赋”《越歌》，实在是反客为主的意味。结合上述至正十五六年间宋濂的诗歌主题变异和诗风变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的宋濂在诗歌创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想法和实践，此时亮出《越歌》，也是表明自己改革的努力。

另外在此之前，杨维禎和宋濂各自的活动区域不同，宋濂不称《竹枝歌》而称《越歌》，可能也是为了彰显这种地域方面的差异。杨维禎的《竹枝歌》，不管是《西湖竹枝歌》，还是《吴下竹枝歌》，都属于“浙西竹枝”。而宋濂的《越歌》，明代卓人月等称之为“镜湖竹枝”，其实也可以称作“绍兴竹枝”，^①属于“浙东”地区的民歌，因为绍兴在钱塘江以东。那么，宋濂之所以主倡《越歌》，是有意承接杨维禎在浙西的成功，转而在浙东倡导并展开《竹枝歌》的传唱。

遗憾的是，宋濂效仿民歌的、“情寓于词”的诗歌创作并未持续多久，昙花一现之后，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① “镜湖”又称“鉴湖”，位于今浙江绍兴。

三 宋濂轻诗重文的原因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以后，宋濂的诗歌创作再也没能延续前两年的风格内容，反而逐渐以文章写作为主，其中原因不少。要而言之，首先是因为战乱导致宋濂安逸的生活环境不复存在。

如果我们将宋濂的人生经历稍作划分，至正十六年（1356年）之前，应该属于宋濂有心寻求文学发展的阶段，而至正十五六年之际，则当视为其巅峰时期。因为在这两年中，宋濂保持了诗歌的高产势头，至今有《萝山集》卷二的一百多首诗存世，这还不包括他随作随焚的作品。文章成就则更高，至正十五年正月，浦江郑氏义门郑涛所编《潜溪集》十卷结集刊行。至正十六年十月，宋濂弟子郑涣又增刻《潜溪后集》。次年二月，杨维禎在为《潜溪后集》撰写的序文中，对宋濂的文章大力褒奖，甚至将他与虞集等元代名家相提并论。

这样的诗文成就，与其当时的生活环境有关。至正十五六年间，宋濂在浦江郑氏义门授学已有相当的年头，一切步入正轨，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这一时期是宋濂人生中最为安定祥和的岁月，最为明显的标志是：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宋濂拓展的新居青萝山房正式落成。这一时期也是宋濂生活和思想上最为自由放松的阶段，友人王祯曾经形象地描绘过宋濂当时徜徉山水、逍遥自乐的状况：

性疏旷，不喜事检饬，宾客不至，则累日不整冠。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间，索笑竟日；或独卧长林下，看晴雪堕松顶、云出没岩扉间，悠然以自乐。^①

如此悠然自得，如此闲情雅致，与中国历史上众多崇尚隐逸、无拘无束的骚客文人几无差别。生活上的平静安逸和事业上的初露头角，使得宋濂产生了诗文并进的念头，我们今天看到的《萝山集》五卷，所收基本上是宋濂出仕金陵以前的作品，可见诗歌创作曾经是宋濂所热衷的。也正是因为拥有了那样一种比较悠闲安逸的生活，使得宋濂在享受生活情趣的同时，唯美尚情的美学追求占了上风，所以才有了《萝山集》卷二众多“寓情”“纤弱”的诗作。

但是好景不长，元季战火很快蔓延开来。至正十七年，战火逐渐延及浦江、金华一

^① 《王忠文公文集》卷二十一《宋太史传》，明王祯撰，《北图珍本丛刊》影印嘉靖元年张氏刊本。



带。此年八月，宋濂避兵诸暨勾无山南。次年三月，朱元璋军队攻占睦州，宋濂遣家人避兵勾无山。六月，浦江被攻占，宋濂也不得不躲避至勾无山。^① 连续的战争和逃难迁徙，不仅使得《越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再次出现，就连赋诗也往往没了兴致。至正二十年之后，宋濂接受朱元璋的征聘，步入金陵政坛，事务繁忙，文债山积，赋诗的闲情就更为衰减了。

宋濂晚年逐渐以文章写作为主，还与他坚持的文学宗旨密切相关。宋濂长期倡导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因此《越女谣》《越歌》之类的言情作品，只能是偶尔为之。即便一时兴起，信笔为之，常常还会经意或不经意地表露出自责或批评的态度，这在上引《萝山集》卷二的题识中表现已经十分明显。所谓“谩钞新稿后，以俟他日删去”，分明是时过境迁之后，对于自己至正十五六年间所作的诗歌尝试，总体有所不满，认为它们不利于自我的修身，无益于社会的教化。

诗文皆应“载道”，要有益于人生和社会，这是宋濂长期坚持的文学宗旨。其著名的《文原》，对于文章修身教化的功能，阐述得更是非常的明确。这一篇文论，原本是文章选集《文章正原》的序言，所选文章皆出自孟子、韩愈、欧阳修之笔，宋濂用于浦江郑氏义门的教学。宋濂在郑氏义门授学，始于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前后持续20多个年头。也就是说，青壮年时期的宋濂已经明确认为，文章乃文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务必承担载道的任务。宋濂经常以此要求自己，也常常以此自责，除了上引《萝山集》卷二的题识之外，以下例子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萝山集》卷五之末，也就是整部《萝山集》的最后一首诗，题作《自题前后续别四集，以识予愧。且寄童允载，允载盖从予学文者》。前、后、续、别四集，是指元季先后出版的《潜溪集》的四个集子^②，此诗写在《潜溪》四集结集之初。诗曰：“为文本欲障颓波，一涉他歧便是魔。漫道有心关世教，支离言语不胜多。”《潜溪集》所收，基本上是宋濂写于元代的文章，刚刚结集，宋濂就表示不满，感觉有愧。何以如此呢？用宋濂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误入了歧途，没有能够“障颓波”。说得更为明确一点，就是认为《潜溪集》的文章没有发挥拯救人心、挽救衰世的作用。当然，这是宋濂针对自己的文章在发表批评意见，不是谈论诗歌，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就诗文两种体裁的功能而言，文章具有

① 参见清人朱兴梯《宋文宪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影印；徐永明《宋濂年谱》，载《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② 根据郑涣《潜溪集题识》，《潜溪集》专收宋濂的文章，诗赋则纳入《萝山集》中。又据《千顷堂书目》，《潜溪集》前、后、续三集“皆前元时所作”。详见《潜溪录》卷四。

“明道”“立教”“辅俗化民”的显效，^①而诗歌在后世主要用于抒写自我心性。何况耽诗成癖，易入魔道。以“载道”的文学观来要求，不要说上述《萝山集》卷二的诸多诗歌显然不符合标准，其余诗篇也难以满足宋濂的要求。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潜在心理，诗集《萝山集》至此终篇，戛然而止。

所以说，宋濂以文章大家著称，文章远超诗歌，绝非偶然。

^① 参见宋濂《文说赠王生黼》，《芝园续集》卷六。